

● 党昊祺

微时代记者角色转变原因探析

当前,官方慈善基金组织的社会信用呈现下滑趋势,而同样是在微博平台,民间慈善则备受欢迎,“免费午餐”、“大爱清尘”、“老兵回家”、“免费书屋”等由新闻记者发起的民间公益活动在短时间内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孙春龙、邓飞、王克勤等记者从新闻报道开始转向公益运作,出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在微时代背景下,这一转变存在着深刻的原因。

记者角色的社会期待出现偏差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巨大的威力,在政府职能缺位的情境下,公众的合法权利被侵害时可能更多会寻求于掌握一定话语权的媒体以伸张正义。他们希冀借助记者新闻报道的巨大影响力来对政府形成“倒逼式压力”,从而在强大的舆论影响之下求得社会大范围乃至官方更高层面的关注,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而对于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来讲,在实际的新闻运作中,也会存在自我角色的认知错乱。在体验式采访备受推崇的今天,记者深入了解事件因果,更为明晰地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政府部门更加了解来自基层的需求,因而在面对社会事件时他们会有更强的“代入感”。目前由新闻记者发起的较大规模的微公益活动,多致力于对弱势群体的帮助,记者在公益方面的着手、渗透、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官方职能的缺失。

新闻理想与现实的背离

在最近的一项针对调查记者群体的职业满意度调研中,“提拔升职”、“福利待遇”、“收入水平”三项位居满意度最低。受调查的记者中,40%的人“不

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报道,30%的人“不确定”,愿意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①承受巨大的精神和生活压力,新闻理想举步维艰。无论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是经济遭遇困窘,诸多因素的合力导致记者这一群体对新闻理想的追求和对本身职业的期盼开始出现动摇,并对职业价值产生了认同危机。

记者对自我角色的重新审视

公民意识是指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追求的自觉反映。它必然产生公民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社会与权力及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认知,以及对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理想化追求。^②

传统模式下,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模式一般是著书立说,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因而在古代知识分子也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③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重塑,在浓厚的商业化影响之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相对开始下降,其发挥自我价值的空间被压缩。记者作为知识分子,如何实现人生价值和自我价值,在目前看来,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妙手著文章、针砭时弊建言献策上,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之下,他们学会了“顺势而为”,即在恰当的时候从说话的人到行动的人的转变。由建言者到行动者、从监督性报道到建设性报道的转变,是在转型时期其寻找到的实现个人理想的新路径。

新闻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在长久的职业生涯中,接触了比较多的社会阴暗面,其在舆论监督报道之后发现,被曝光关注的社会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因此改变,甚至相似事件的不断发生使其累积了大量悲观情绪。^④更直白来讲,新闻报道带给记者的荣誉可能只是局限于

自我,而在其成为行动者、公益践行者之后,在其影响下带动社会力量为国家社会的发展做出的切实贡献,使现状得以切实改观,这就为其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打开了另一扇窗。

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的推动

在新媒体时代,微博的双向互动性、裂变式、即时性、多级信息传播模式,有利于短时间内信息的传播,更有利于公益运作监督的实现。

在微博这个舆论场,新意见领袖积累了大量的民意,甚至在某些时候比官方机构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知名记者本身作为意见领袖,在微博之上和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进行互动,设置议题,转发和评论信息,引导多元化参与,可谓一呼百应。与此同时,因为微博平台的开放性,每一个微博用户集信息发布者、接受者、反馈者于一身,谁掌握信息谁就占据主动。公众可以将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发布到该平台上,可以对社会问题的发现、公益项目的运作和善款物资的使用等形成外在的监督效力,多方推动公益项目的公开透明化,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新闻记者带着问题到实地进行探访和考察,借助于微博平台发布信息,带领“粉丝”们在陷入窘境的官方公益事业中“披荆斩棘”,最终闯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民间公益道路。

注释:

①张志安 沈菲:《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②③陶东风:《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④赵智敏:《社会转型期记者的角色冲突与调适》[J],《新闻爱好者》,2007年第8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